

中国的中东外交

从苏丹个案看中国对阿外交之成长*

王 猛

摘 要: 苏丹是中国外交参与程度较深的发展中国家, 中苏双边关系的发展演变不仅始终彰显着“共同发展”的主旋律, 也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对阿外交的成长轨迹。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时期, 中国和苏丹的相互援助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 整体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在此后的全球化浪潮中, 中国逐步深度参与了苏丹的经济事务, 帮助苏丹实现了经济腾飞和国内持久和平。以南北矛盾和达尔富尔人道主义灾难为主要内容的苏丹危机, 是中国外交参与国际事务时必须直面的挑战之一。中国外交必须重新审视与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应对技巧, 在深度参与中逐步走向成熟, 实现外交转型和国家形象重塑。

关键词: 中国外交; 苏丹; 对阿外交; 共同发展; 中东政治

作者简介: 王猛, 博士,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陕西西安 710069)。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0)02-0019-08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07JK128)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4ZD02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国和苏丹大致从19世纪中期都开始了“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各自所具有的内外条件不同, 两国既由于共同的历史遭遇而经历了过程相似的历史进程, 又因为共同的发展问题而在很多时候有着相似的愿望和诉求。总体上看, 中苏半个世纪来各自的路径探索实践和政治软权力互动, 本质上都是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一种理解和探索, 整体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 丰富了人类社会的共享价值。

一、民族解放运动背景下的相互援助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期间,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为更多国家所理解, 周恩来总理作为世界级外交家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多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 随后数年内即有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和苏丹等5个与会的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在此次会议期间, 中苏两国总理进行了友好会晤。此后, 中国热情支持苏丹的独立, 赞赏苏丹奉行和平中立、同一切国家友好的不结盟政策, 从发展贸易和文化关系入手积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苏丹则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上赞成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不介入态度, 呼吁通过政治谈判和平解决冲突。1959年2月4日, 双方水到渠成地正式宣布建交。^{[1]140-141}

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苏期间,阿布德主席盛赞中国革命,认为中国人民的光辉斗争和所取得的胜利创造了近代历史上的荣誉,希望中国在巩固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发挥作用。^{[2]628-629}在1971年欢迎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合国的讲话中,苏丹认为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参加联合国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开辟了联合国“抱有希望的新时代”^{[3]136}。重返联合国的中国在安理会否决了不利于苏丹的提案,在人权委员会中反对指责苏丹政府在南部苏丹、努巴山脉和达尔富尔地区违反人权的提案。1969年上台的苏丹新政府很重视同中国的合作,于1970年4月派两国建交以来的首任专职驻华大使。1970年5月赴喀土穆履新的杨守正大使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外派大使之一,这被许多国际媒体看作是“中国向亚非拉开展的外交新攻势”。苏丹此后反对超级大国和地区霸权主义国家的相关举动,被看作是“第三世界团结反帝反霸事业的光辉榜样”。中国在这一时期给予苏丹的援助,规模大、项目多、竣工快、贷款使用率高,在阿拉伯和第三世界国家中获得了良好反响。^{[4]23}而与一系列以友谊命名的援建工程相比,中国对援助“相互性”的强调在苏丹朝野更得人心,尼迈里总统赞扬中国政府不附加条件的援助“无私且令人放心”^{[5]31}。

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新中国用世界革命的视野看待亚非拉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热情支持苏丹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他们争独立、反侵略的正义斗争,始终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对相关国家内部各对立派别一视同仁,赞同他们从各自立场出发为推动本国社会发展而做出的努力。同样,尽管自身路径探索经验的学理化和精细运用程度还有所欠缺,有一段时间甚至是错误且不切实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革命历程和发展经验仍对苏丹等曾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相关国家、地区和组织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模仿及与中国的接近,是它们从自身实际出发而作出的选择和探索。可以说,中国和苏丹之所以在这一时期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就是因为都坚信通过浴血奋战能够获得应有的独立和尊严,能够使人类社会的未来更公平、更合理、更美好。双方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豪情和昂扬斗志,现已成为一种精神财富而让人怀恋,并为双方新时期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起点和基础。

二、中苏对全球化的不同因应和共同发展

始自西方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从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席卷全球。几乎所有后现代国家都在压力下进行着艰难的社会变革,并基于各自国情而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因为辉煌历史和落后现实映射出的巨大心理反差,也由于世界“动荡弧线”的历史惯性推动,更因为拥有可以对世界经济兴衰产生关键影响的战略资源,伊斯兰世界成为发展中国家群体中最敢于对现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发起挑战的力量。自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在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落伍的苏丹非常认同来自传统信仰的伊斯兰复兴浪潮,甚至已两度的官方伊斯兰化。1989年后宗教政党与军人政权的联盟,开创了战后伊斯兰国家发展道路的新尝试,被称为“伊斯兰试验”。本·拉登在海湾战争结束后一度以苏丹为基地加紧赞助反美伊斯兰组织。当然,苏丹也为自身不切实际的伊斯兰化付出了惨重代价。1983~2005年的第二次南北内战造成200万人死亡和400万人流离失所的惨重后果。苏丹社会发展在1985~1989年间停滞不前,国际社会的援助在1992年后几近停止,1999年的外债高达200亿美元,是当年苏丹GDP的两倍多。^{[6]404}事实上,在持久而全方位的西方式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传统政治架构迅速瓦解,综合国力衰退,生存环境恶化,民族感情和民族心理受到了严重伤害。苏丹前总理萨迪克·马赫迪曾悲愤地控诉道:“在落后和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我们像一个跳蚤,怀着道德和精神上的种种顾虑,面对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人”^{[7]5}。

和苏丹对全球化的抵触不同,因为刚经历过20世纪天翻地覆的时代变迁,尤其是10年“文

革”所造成的传统意识淡漠和否定性的改革开放起点，当代中国对一切新事物基本都持欢迎和愿意尝试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是两种形式与内容均不相同的现实性全球化思潮。中国在 20 世纪后半期对二者热情洋溢的拥抱，其内在统一性在于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某种修订关系。前者彻底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四分五裂的政治乱局，建立了高效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开创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大一统局面；后者则在既有框架内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航向，依凭前者营造的制度优势维持了长达 30 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为众多“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海外华侨、世界银行、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累计向中国提供了超过 2000 亿美元的贷款和投资，随之还带来了相应的技术、管理、培训以及与全球供应网络的连接。这是同时期最庞大的全球发展援助。^[8]中国则在融入世界秩序的进程中成功地使自身经济规模迅速壮大。在 1978~2008 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 1400 亿美元跃升至 4.3 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由 1% 提高到 5.5%，世界排名从第 15 位升至第 3 位；对外贸易从 206 亿美元增至 2.56 万亿美元，位次从第 32 位攀升至第 3 位，利用外资连续多年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在家电、服装、钢铁等简单制造业领域，已经担负起许多大宗商品供应者的角色。^[9]从参与全球化的实际效果看，“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在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方面，经历过如此迅速的改善……中国所取得的全部成功都带有改革开放，即全球化的印记”^{[10]5-6}。

中国自 1992 年开始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年底明确提出了“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战略方针，中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的“走出去”战略随之拉开了序幕。与此同时，严酷的现实迫使苏丹领导人必须超越自身的宗派主义及阿拉伯主义限制，从真正为全民谋福利的角度来实现革命后社会的常态化，其实现途径就是巴希尔用枪杆子战胜了图拉比的笔杆子，结束了长达 10 年的军人政权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联姻。2000 年底，连任总统的巴希尔提出将生存权作为基本权利，苏丹的内外政策此后渐趋常态化。中苏在新的历史时期找到了更多的契合点以及更坚实的合作基础，以经济事务为平台实现了国家间常态合作的跨越式共同发展。

长期以来，虽具备形成大型油田地质的条件，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苏丹不仅无力发展石油工业，每年还不得不耗费巨资进口成品油。1996 年，中石油应邀自带资金和技术开始了同苏丹的能源合作，1997 年成为苏丹国际石油财团的控股公司。^{[11]32}1999 年 8 月 30 日，随着第一艘满载原油的油轮驶离苏丹港，苏丹正式加入了石油出口国的行列，是年被誉为苏丹的“石油年”。哈季利季油田是中石油在苏丹最早发现并投产的大规模整装油田，随后又有多个油田相继投产，输油管线和炼油厂等配套设施也日趋完善。截至 2008 年底，中国在苏丹累计投资已超过 150 亿美元，形成了一个包括上、中、下游的完整的石油工业产业链。苏丹约一半的出口石油流向中国，占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 5%。^{[12]51}2008 年，中苏双边贸易额达 81.78 亿美元，苏丹是中国在非洲的第 3 大贸易伙伴，中国是苏丹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苏合作对苏丹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表现为帮助苏丹确立了优先发展产业，以点带面推动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 1999 年之后的 10 年间，中国石油公司帮助苏丹建立了一整套体系完善、技术先进、规模配套的石油工业体系，为当地提供了 8 万多个就业岗位，带动了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发展，真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了发展优势。^{[13]62-64}得益于中国的帮助，苏丹仅用 10 年时间就成长为重要的新兴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是非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通胀率由 110% 降至 8%，实现了国内持久和平。^{[14]97}其次，中方在合作中注重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造福当地人民。中国公司的打井、筑路、修桥、建医院、兴学校之类善举让 200 万苏丹人直接受益，承建的麦洛维大坝因有望基本解决整个北方的电力供应问题，被称作“苏丹的三峡工程”^{[15]31}。最后，

中方在合作中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当地人才，为苏丹发展奠定人力资源基础，中石油苏丹项目区员工的本地化率已超过 90%。

中苏实现双边经贸跨越式发展的动力，中国方面因为经济的快速崛起带动了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同时也有以多边外交抗衡西方国家“遏制”的考虑。而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积极接纳与回应，除冷战时期双方建立的友谊和互信、中国始终沿袭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以及高效的对外援助等因素外，更有中国发展模式的辐射效应。对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包含发展、稳定、和谐三因素的“北京共识”，远比“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华盛顿共识”更有吸引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经有 5 个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协助建造和苏丹一样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苏丹有望成为中国在新时期参与中东、非洲乃至发展中国家事务的桥头堡。

三、需要共同超越的“达尔富尔命题”

2003 年之前的苏丹危机主要是漫长的南北内战，现在则是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未来恐怕更会关注因 2011 年南苏丹人全民公决而可能再度激化的南北矛盾。尽管不同时期的具体内涵不同，但危机本身却始终是中苏两国必须直面的发展命题。尽管中国对阿拉伯事务依旧保持着“整体超脱”的基本态势，但在苏丹这个局部的点上，中国外交的介入程度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也前所未有。

作为苏丹石油资源的主要开发者之一，中石油 2007 年的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分别是 16696.9 亿、10006.8 亿、2069.7 亿和 1496.4 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分别为 2319.1 亿、1389.8 亿、287.5 亿和 207.8 亿，而苏丹 2007 年的 GDP 总共只有 473 亿美元，财政收入为 90.4 亿美元。^①在这样悬殊的经济数据面前，不管中石油自己是否承认，它确实已是苏丹社会中一支重要力量。而正是以中石油为代表的中国因素在苏丹社会的强大存在，美国前任苏丹问题特使纳西奥斯才会在就任后首访中国寻求支持而不是去苏丹或非盟，苏丹才会在胡锦涛主席访苏后正式接受在达尔富尔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

对苏丹而言，不论西方国家积极介入苏丹内部事务的背后动机是什么，达尔富尔危机成为国际热点首先还是源于自身局势的恶化。从危机处理的视角看，苏丹政府显然对达尔富尔危机的大规模爆发缺乏心理准备，基本处于被国际舆论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境地，或过分强调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或竭力淡化问题的严重程度，或以“内政”为由拒绝外国武力干涉和在境外审判战犯，或在接受和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时讨价还价等。苏丹政府虽然最终也做出了种种让步，但国际社会却对苏丹政府的能力和诚意产生了疑虑。苏丹政府要解决自身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切实推进现代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双重建构，就必须与时俱进地从战略战术两个层面改进对国际事务的回应和参与。

尽管达尔富尔首先是苏丹和非洲的达尔富尔，但却很容易把它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因为中国被看作是能够对苏丹政府施加影响的国家。一旦在中国和达尔富尔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将不可避免对中国参与苏丹事务产生曲解和误读。中苏传统友好及其以发展为主旨的经济合作、中国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等被西方广泛理解为对苏丹社会在治理和人权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漠视，批评中国参与苏丹事务只是遵循一项完全基于狭隘经济利益的政策而罔顾人权和“良治”的进步。^{[16]137} 那些关注非洲人权状况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认为，既然石油是苏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在苏丹投资的外国石油公司就对不

① 相关数据引自国家外交部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网站，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按时价 1: 7.2 计算。

断升级的苏丹社会冲突负有道义责任；对苏丹政府的制裁要取得实质性效果，就必须对在苏丹的外国石油公司及其母国政府施压。^{[17]63}一些西方政要指责中国没有采取制裁措施迫使苏丹政府有效平息达尔富尔冲突，断言中国与非洲国家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是一种唯利是图的“重商主义”，是对非洲大陆的新殖民主义。^{[18]48}从实际效果看，西方对中国的这些指责是否公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指责增添了建构国家软权力的代价。2005年9月，美国政府在提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概念时，明确将促进苏丹冲突的解决列入希望看到中国负起国际责任的具体议程。

由于与苏丹关系浓缩了中国与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达尔富尔命题”深刻昭示了中国在海外利益拓展、国家形象塑造、国际事务参与等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必须重新审视与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外交应对，在深度参与中实现外交转型和国家形象重塑。中国外交只有量力而行以有所作为，切实解决好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到苏丹达尔富尔等一系列相似“命题”，赢得众多不发达国家的战略信任，这样才能突破发展的舆论瓶颈，自下而上地建立中国话语空间，为自身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

四、中国对阿外交在深度参与中成长

就中阿关系的发展而言，从1956年5月的中埃建交到1990年7月的中沙建交，中国与所有的22个阿拉伯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就整个中东地区而言，中国和以色列是最早相互承认（1950年1月）但却最晚建交（1992年1月）的一组双边关系，中以建交标志着中国在中东全方位外交的真正开始。在20世纪后半期的冷战背景下，中国参与阿拉伯事务从埃及到沙特的政治—经济演变进程，参与中东事务从以色列到以色列的曲折发展，既折射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逐步深化，也见证了国家对阿外交的成长历程。

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角度看，新中国前30年尽管在独立和尊严等民族目标上取得了空前的历史成绩，但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内基础并不稳固，经济规模不大且质量不高，人均收入排名比较靠后，直至2008年仍在全球百名之后（第109名）。^[19]民权和民生发展进程的相对滞后导致对外参与时的软硬权力运用都或多或少受制于人，中国还不具备提出相应规则和规范的主客观条件，能力和愿望、现实和期望之间存在较大落差，难以酣畅淋漓地展现憧憬中的全球角色，相当深刻地体味着成长中大国的艰辛与尴尬。在这种背景下，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在仔细思索自身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后，确定了“韬光养晦”的指导思想，即“善于守拙”、“不当头”和“整体超脱、局部介入”，将相对有限的外交资源用于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具体到对阿拉伯事务的参与，中国行为体始终坚持“整体超脱、局部介入”的参与策略，既不认为暂时超脱就会被边缘化而致使利益受损，也不幻想能够一蹴而就永久拓展自身影响，始终用一颗平常心客观冷静历史全面地看待自己和别人，在守住服务国内建设这一根本的前提下从容参与阿拉伯事务。尽管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不曾列入国家对阿外交的主要议程，包括苏丹第二次南北内战等，但也正是得益于这一适当的外交政策，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同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政治大国。

有两方面因素推动了中国对阿外交在参与中逐步走向成熟：从外部看，虽然阿拉伯国家现阶段的对外参与也普遍欠缺细腻、深入和全面，但中国参与阿拉伯事务的对象并不仅仅是阿拉伯国家，还要考虑已在当地经营多年的欧美国家因素，需要以更细腻有效的全方位外交应对参与过程中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从内部看，凭籍改革开放30年来的积累和经营，中国已初步奠定了作为世界强国的基础，对阿拉伯事务已经超越了早期单纯而激情的政治参与，日趋紧密的经济联系带动了双方在军事、安全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作。这构成了推动国家对阿外交调整的持久动力。

中国对阿外交逐步成熟的表现有三：首先是参与阿拉伯事务的中国行为体日益扩大，涵盖了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政党、个人、民族、国际政治运动、宗教运动与组织等多个层面，既以行为体的多层次性构筑了中国外交必需的战略纵深和战略空间，又以参与行为体的广泛性保证了参与内容的丰富性。其次，中国行为体在参与过程中越来越深入地借鉴了西方同行的娴熟手法，不泛化不虚化遭遇的具体问题，就事论事地分析和应对；同时对自身的定位也越来越实际，不妄自菲薄，不妄自尊大，深化细化自身与阿拉伯世界相应机构的对等交往，对外交往中以“复杂对复杂”的大外交格局正在形成。最后，政府部门在整合国内各行为体参与阿拉伯事务的过程中重点强化了参与规范和参与安全，既以多元外交格局的合力形式初步改变了外交部门的孤军作战状态，又推动了中国外交从“高级政治”领域向“低级政治”领域延伸。

成长中的中国跨国公司和个人行为体已经为中国外交的这种借鉴和学习提供了条件。截至2007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达到1.2万家，外派各类劳务人员约418万人，遍及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20]日益壮大的中国跨国公司被看作是夹杂在服装、电子产品和玩具等商品洪流中的“最新出口产品”^[21]。从毛里塔尼亚的港口建设到摩洛哥的深海渔业，从阿尔及利亚的住房和高速公路施工现场到埃及的国际会议中心和苏伊士开发区，从伊朗的德黑兰地铁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轻轨项目，从苏丹、沙特等国的油田钻探到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电站建设和矿产开发，从阿曼、沙特的宽带通信到利比亚、摩洛哥的3G网络建设……成长中的中国跨国公司既在一路跋涉中收获着利润和美誉，也凭藉典型示范和本土化策略扎实地改变着当地的技术和社会生态。中石油帮助苏丹从石油进口国一跃成为出口国，华为公司让突尼斯的入网费降低了50%。中兴公司使利比亚移动通信的入网费由800美元直降至不到3美元，移动电话普及率从1%提升至100%，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固定话费国家。

尽管在1949~1977年间总共只有28万人次出境^{[22]40}，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和综合国力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公民外出经商、旅游和留学越来越频密，2008年的出境人数达4584万人次，不仅比1978年的20万人次整整增长230倍，且其中绝大部分（87.5%）是因私出境。^[23]作为走出国门的“民间大使”们，中国公民个人行为体参与国际事务的意义越来越突出。地质学家苏永地先生对中石油整个苏丹项目的快速获得成果功不可没，而中石油的苏丹项目稳定地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深入发展。^{[24]102-106}在苏丹大手笔经营农场的中国农民不仅给当地带来了新的作物种子和技术经验，供应着苏丹市场上的绝大部分阔叶青菜，而且以各自的绵薄之力切实推动了苏丹的社会发展，缓解了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在范传钊所开农场工作的20多名达尔富尔工人，就以他们相对稳定的收入保证了其家人中无人投奔难民营。^[25]就中东地区而言，这些彰显外交意义的个人行为体，不仅包括让喀布尔夜晚亮起五彩灯光的浙江商人老黄，在海湾地区创办阿里巴巴商务卫视的浙江商人王伟胜，执教10余载、帮助科威特国家队赢得50多枚金牌的体操教练王平，与黎巴嫩籍丈夫在加沙辛勤打拼的北京姑娘曲阳，还包括在中东各国恶劣条件下救死扶伤的中国医疗队队员，在阿联酋辛勤打拼的10余万中国商人，在开罗走街串巷的中国背包小贩。从更深层的意义看，越来越多参与阿拉伯事务的个人行为体，既以勤劳和智慧拓展了各自的人生轨迹，又以新型的人文情怀从具体而微观的个体层面丰富和塑造着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形象。

五、结语

改革开放前，由于国际格局、意识形态和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利益边疆与主权边界基本重合，国家安全着重强调“井水不犯河水”，是一种主要维护国家生存权的安全观。中国外交在很长时间内也一直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型参与模式，“开会举举手”的单一需求决定了国家间

交往只能是浅层的“见面握握手”。这一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多限于政治领域的同仇敌忾，把阿拉伯国家笼统看作一个整体并不妨碍中国对阿拉伯事务的参与，反而有助于营造中国与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的共同话语空间。但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融入国际社会进程的加快，中国利益边疆超越主权边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的“井水”与世界的“河水”经常流在一起且很难区分。^{[26][21]}同社会发展程度影响外交成熟程度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整体成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外交的成长。参与国际事务的中国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数量和类别都有了较大拓展，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有了质的飞跃，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丰富了中国外交的内涵，同时也大幅增加了外交决策的难度。正因为包含着越来越多的实质内容和责任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才会以越来越大的合作气度和有进有退的灵活度替代过去的不妥协传统。作为整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在的对阿外交虽从表面看似乎没有了某种酣畅淋漓的豪情，但成熟的总体外交体制已隐然成型，点点滴滴都显示着实实在在的成绩和进步。

从政策制定视角看，中国在苏丹的利益存在以及这些利益代言人的游说活动促进了中国对苏丹政策的内部讨论，保证了相关政策的针对性和连续性。这影响了中国参与苏丹事务的立场选择和措施实施，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理性和机制化。中国企业在苏丹等国的海外投资，固然增加了中国对外参与的立场选择和措施因应难度，政府也应该制定更完善的规章制度约束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行为，但不能由此断定它就损害、有时甚至是“劫持”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至少中国现在的对阿外交主要还是基于传统外交信念和整体利益考虑。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不是空洞的纸上崛起，中国成长壮大的具体内容和表现之一，就是以中石油为代表的中国公司在海外利益的延伸。中石油的苏丹项目区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海外利益区。成长中的中国外交当然不能受制于某个公司的具体利益，但有恒产者有恒心，充分考虑并保护中国公司的海外利益是一件自然也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中国对阿外交在成长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沮丧情绪：首先是随着对特定事务介入程度的加深，中国自身和国际社会都越来越认识到，导致阿拉伯世界某些问题棘手而长期难以解决的真正根源在于其内部，中国愿意也能够在一些问题上发挥独特作用，但不能因此而高估中国对相关事务的影响力。一些西方媒体也呼吁民众不要在中国问题上哗众取宠，认为达尔富尔问题归根结底不是中国造成的，不会因为中国的全力投入或者完全退出而彻底解决或瞬间消失。^[27]而从中国自身角度看，当社会发展长期被理解为GDP增长，当真正推动国家发展的公民社会基础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我们以自身立场对阿拉伯乃至发展中国家事务的一些解读就不免引起反感，如回应西方媒体对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指责时，应该侧重中非合作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实际推动并以此反证西方的殖民统治是导致非洲长期动荡乃至贫困的罪魁祸首，但不应该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否则不仅得不到西方的积极回应，也容易在与西方有传统联系的非洲国家引起反感。

[参考文献]

- [1] 王泰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 [2] 王泰平. 新中国外交 50 年（上册）[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3] 历史潮流不可抗拒[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4] 刘宝莱. 记苏丹前国家主席尼迈里访华[J]. 阿拉伯世界，2004(2).
- [5] 刘宝莱. 记我援建苏丹项目竣工[J]. 阿拉伯世界，2004(5).
- [6] Mansour Khalid. War and Peace in the Sudan: a Tale of Two Countries[M]. Kegan Paul Limited, 2003.

- [7] G·H·詹森. 战斗的伊斯兰[M]. 高晓,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8] Joshua Muldavin. China's Not Alone in Environmental Crisis[N]. Boston Globe, 2007-12-19.
- [9] Robert J. Samuelson. The Real China Threat[N]. Washington Post, 2008-08-20.
- [10] William H. Overholt. China and Globalization[M].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5.
- [11] 戴新平. 苏丹——新的石油输出国[J]. 阿拉伯世界, 1999(4).
- [12] 李主张. 今日苏丹, 今日达尔富尔[J]. 金融经济, 2007(10).
- [13] 杨宝荣. 中国与苏丹经济合作促进两国共同发展[J]. 当代世界, 2008(5).
- [14] 刘鸿武, 李新烽. 全球视野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 [15] 蔡敏. 润物无声反哺情[J]. 中国石油石化, 2007(17).
- [16] Ian Taylor. China's Oil Diplomacy in Africa[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6(82).
- [17] 查道炯. 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 国际政治课题[J]. 国际政治研究, 2006(4).
- [18] 安东尼·哈尔夫. 中国是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者吗?[J]. 商务周刊, 2006(20).
- [19] Michael Sheridan. China Can No Longer Save World[N]. Sunday Times, 2008-11-30.
- [20] 陈德铭. 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全面开创商务工作新局面——在 2008 年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R].
- [21] Justin Pritchard. The Newest Chinese Export: Companies[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08-03-17.
- [22] 冯亦珍, 陈醇. 出境游凸显中国元素[J]. 瞭望新闻周刊, 2007(19).
- [23] 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09-01-01].
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searchword=2008&channelid=4362&record=20.
- [24] 李向阳. 穿透地层的目光[J]. 中国石油企业, 2005(4).
- [25] Clifford Coonan. China's New Export: Farmers [N]. Independent, 2008-12-29.
- [26] 杨成. 利益边疆: 国家主权的发展性内涵[J]. 现代国际关系, 2003(11).
- [27] Mark Leonard. No Grandstanding on China, Please[N]. Times, 2008-02-16.

The Maturing of China's Arabian Diplomacy: A Case of Sudan

WANG Meng

Abstract: Sudan is one of the key countries in China's Middle East diplomac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Sudan and China has not only always shown the main melody of "common development", but also clearly reflected the growth track of China's Arabia diplomacy.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Sudan and China during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period has pushed forwar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rogress generally in the third world. In dealing with the globalization wave, China has been participating in Sudan's economic affairs gradually and helping Sudan to achieve its economic take-off and domestic long-lasting peace. Consequently, Sudanese crisis, characterized by its South-North contradiction and Darfur humanitarian disaster, is one of the main challenges for China's 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ina must re-assess its basic content and technique in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st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aturing itself in the deepening involvement in the Arabian affairs, achieving its diplomatic transformation and rebuilding its country image.

Key Words: China's Foreign Policy; Sudan; Arabian Diplomacy; Common Development; Middle East Politics

(责任编辑: 杨 阳)